

文化研究视野下的社会流动研究

徐德林

(北京大学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871)

[摘要]社会流动现象及相关问题在中国内地日渐突出。其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影响是多层次的。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诸多人文及社会科学,纷纷踏上社会流动研究的快车,广泛关注和讨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底层流动和迁徙,在中国引发了一股社会流动研究的热潮。中国内地学者对社会流动的研究正开始呈现出良好势态,并且已然取得一些值得肯定的成果,但客观地讲,他们的研究还并非成熟与完善。由于社会流动的内涵是什么、如何进行社会流动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答,中国内地的社会流动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还处于盲动或者混乱之中,参与其间的学者难以进行有效对话,社会流动研究的意义难以得到彰显。

[关键词]社会流动;流动研究;文化研究;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5-0009-05

作为一种永恒的人类社会现象,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或者“人们的地位、位置的变化,更精确地说……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与地理空间结构中位置的变化”。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会有社会流动的陪伴,尽管其间的社会流动可能有着不同特征及呈现形式,或垂直或水平,或先赋性或后致性。而且随着社会开放度的提高,社会流动的速度与规模也注定会日益加剧与扩大。所以,随着市场经济地位在新时期的中国内地的进一步确立,尤其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全球化的影响,社会流动现象及相关问题近年来在中国内地日渐突出,已然成为一道壮丽的社会景观,绽放在各行各业及不同社会阶层。其间既有国内流动、也有国际流动,既有中国人的流动、也有外国人的流动,既有人的流动、也有资本的流动,既有为生存的流动、也有谋发展的流动;其影响不仅反映在了经济之中,而且也体现在了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以农民工流动/迁徙为代表的社会流动已然在近年引起了中国内地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及广大人文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社会流动研究一夜间便在中国内地成为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或许可以更加准确地讲,随着“三农问题”及“讨薪热”等“底

层问题”在新世纪的浓墨重彩式浮现,中国内地的人文知识分子普遍有了一种新的“自觉”实践——对社会底层,尤其是社会底层的流动的关注,甚至可以说,对社会流动现象的考察与研究已然成为中国内地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姿态。

一、文化研究中的社会流动研究范例

尽管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已然以异质性为其显在特征,比如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研究以知识生产为主,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研究则以社会运动为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当今世界的文化研究仍然具有极强的同质性。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地的文化研究几乎无一例外,仍然是在以由伯明翰传统所代表的具有相对实体性质的英国文化研究为其准绳。作为其表征的是,参与社会流动研究的文化理论家一致认为,社会流动无异于日常生活的其他面向,无异于文化研究奠基人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所谓的“活生生的文化”(living culture)。受“揭示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一学科诉求的驱使,文化研究自然地赋予了作为文化与权力指向标的社会流动高度关注,在学理层面上对其进行了一系列考察与研究,尤其是自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的多元策略被广泛实施以来。在其主持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

• **[收稿日期]**2007-07-23

[作者简介]徐德林(1968—),男,汉族,重庆市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博士。

中心(CCCS)工作期间的 1983 年,约翰逊发表了“究竟什么是文化研究?”一文。由于这篇得到文化研究界公认的重要论文“从方法论上讲……反映出文化研究对后结构主义的某些方法越来越感兴趣;从主题上讲,约翰逊的视野和设想更加广阔,认为凡是与文化研究有关的课题都应该研究”,以及受到由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在全球不战而胜等其他因素的影响,1980 年代中期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便在引进更多理论资源的同时,开发了更多的研究领域与客体,如种族问题、流散问题、性别歧视及同性恋问题等。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文化研究领域的诸多批判知识分子毅然开始了社会流动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既有的伯明翰传统。

在较早研究社会流动的文化研究实践者之中,位列榜首者当是享誉世界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文化研究专家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早在出版《书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这一著作的 1986 年,克利福德便表现出了自己对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代表的文化静态研究或者参与式观察的不满。克利福德认为,文化并非是人类学家在“田野”(field)中观察到的客观结果,而是恰恰相反,文化是人类学家对田野调查结果的主观书写,知识、权力等诸多因素都纠缠于其间。后来在举办于美国伊利诺伊斯大学香槟校区的题为“文化研究的过去与现状”的 1990 年文化研究研讨会上,克利福德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对传统民族志的不满话语,提出并阐释了他著名的“旅行的文化”(traveling cultures)这一观念。具体地讲,克利福德坚持认为,由于“从未存在过当地人(native),即局限在他们所属的地方并受他们所属地方限制的人,或者在接触更大的世界时没有被玷污的团体”,我们必须对文化进行重新思考,必须视文化为作为居民生活兼旅行的场域(sites of dwelling and travel),即“生活中的旅行”(traveling-in-dwelling)与“旅行中的生活”(dwelling-in-traveling);或者说文化始终处于旅行之中,文化的世界是一种混杂的、世界性的经验。因此,应当成为文化研究实践者研究对象的,并非是待在家里的人,而是人的旅行,比如中产阶级男性的休闲式旅行、难民的被迫异置(displacement)、水手的作为工作的旅行、香客的旅行及各种形式的旅行,从而达到重新思考文化的目的。

虽然一些文化理论家曾经指出过旅行这样的流动研究之中的男权中心主义倾向,以及不赞成把旅行这样的社会流动提升到文化研究的核心位置,

但是克利福德的“旅行的文化”通过对各种联系的强调,成功地避开对文化的我们/他们式二元思考,一方面分离开了“空间”(space)和“地点”(place)(前者高于后者),另一方面成就了“混杂性”(hybridity)在文化研究中的关键词地位。正如他的所谓“斯宽托效应”(Squanto effect)所表明的那样:

当然,斯宽托就是那位印第安人,他于 1620 年在马塞诸塞州的普利茅斯接待了清教徒们,帮助他们渡过了一个严寒的冬天,英语说得很好。如果你要试图想象全部的效应,你就必须记得 1620 年的“新世纪”的模样;你可以在五十英里以外的海上嗅到松柏的味道。想一想从遥远的欧洲来到如此的一个新地方、拥有闯入一个叫做普土塞特(Putuxet)的村落的离奇经历。

在社会流动研究中,经常和克利福德一起被讨论的是英国文化社会学家多雷恩·马瑟(Doreen Massey);他所关注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点的全球感”(global sense of place)。

根据沃伦斯坦(Wallerstein, 1981)的世界体系理论及吉登斯(Giddens, 1990)的现代性理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全球化过程始于 15 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建立。全球化的发展并非像诸多现代化先知们所预言的那样,必然出现一种具有同质性的全球文化;事实恰恰相反,全球化所创造的并非一种简单文化,而是一系列相互纠缠的文化。而且,我们正在体验的全球化过程甚至已然冲垮了文化身份与民族——国家之间长期形成的密切关联;国际劳动分工、跨国媒体企业的文化生产、新型政治联盟、生态同盟等,都在严重地挑战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权力,创造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文化地理。

因此,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考察,必须考虑资本、人员、形象及商品的流动(flow)以及它们彼此的关联。比如,就日益表征着全球化特征的日常生活用品而言,我们虽然可以根据其商标知道其产地,但是对其原材料产地、资本源泉、工人背景等因素却无从查考。因此马瑟认为,在我们对全球化的考察过程之中,我们必须高度关切“不同的社会团体,以及不同的个人被以不同的方式安置到这些流动及彼此的关联之中”的方式。具体地讲,虽然全球化必然会引起社会各个阶层的流动,但是无论是不同阶层的流动本身,还是它们对全球化的感受,都不尽相同;全球化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地点及其位置都直接联系着资本、人员、形象及商品的流动。这便是马瑟借助伦敦的克尔本(Kilburn)大街所揭示出

的“地点的全球感”,它不仅普遍存在于任何地点,而且越来越厚重;日常生活中的在地性(locality)都是混杂与融合的结晶,构成于诸多文化的凝聚(coming together)。也就是说,马瑟强调地点是呈现“空间”所涵盖的复杂社会网络的具体地点,地点的身份不是来自它的内部,而是来自它与其他地点的互动和关系,即地方特色不是一个地方固有的内部特质,而是它与其他地方互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抛弃那种视地方为封闭空间的旧有观念,代之以地方为开放空间的新概念,并从复杂的权力和利益的互动中确定地方的特征。这样,马瑟就和克利福德一起,推翻了“时间代表前进或进展,空间则代表固定和停滞”的观点,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运作及该背景下的资本和人员的国际流动。

另一位对社会流动有着精深考察和精辟论述的文化批评家是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他通过《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一书有效地挑战和超越了以内部同质和以国家为界限的文化思考。为了填补种族在已有现代性书写中的缺失,吉尔罗伊在书中提出了使他蜚声世界的“黑色大西洋”这一概念,并借助音乐等文化产品对作为“一种跨文化及跨民族的结构”的“黑色大西洋”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吉尔罗伊在此间所使用的主要例证之一是一种叫做拉普(rap)的黑人音乐。

拉普是一种混杂的音乐形式,它根植于南布朗克斯(Bronx)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1970年代被移植的牙买加音乐文化在那里扎下了新根,并且通过与具体技术革新的契合,启动了一个即将改变黑色美国的自我意识及大部分音乐产业的过程。

吉尔罗伊认为,拉普所凸显的不仅仅是非洲黑人或被迫或自愿的迁徙在大西洋两岸形成的“非裔流散社团”(African diaspora),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人员、思想、金钱、物体和音乐等因素在流散社团形成过程中的流动和往复交互作用。最后,吉尔罗伊通过对杜·博伊斯(W. E. B. Du Bois)的“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及理查德·奈特(Richard Wright)的相关思想的考察,延续和发展了彼得·莱恩鲍格(Peter Linebaugh)及马尔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的以跨大西洋、跨民族关联视野书写历史这一思想,并基于泛非洲政治提出了他自己对流散概念的看法——“这个概念应该因其建构起族群同一性与差异化之间的关系的能力而得到珍视”,即理解每一部分黑色大西洋或者非裔流散社团,都必须联系上它与其他部分的关系,因为流散社团中的“所有文化都是混杂的,其所

有产品都是混合的”。

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不仅得到了文化研究同仁们的珍视,而且极大地冲击或者震荡了英国文化研究。一方面,它引发了相关主题的诸多研究,如由阿苏玛(Seth N. Asumah)与阿努梦佛(Ibipo Anumonwo)合著的《多元文化问题:跨民族的视野》所代表的非洲人流散社团研究、由肖恩·莫里斯(Shaun Moores)的《现代社会的媒体与日常生活》所代表的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印度/巴基斯坦人的流散(社团)研究;另一方面,它得到了进一步的修订与完善。由斯内加·古诺(Sneja Gunew)的《受尽折磨的民族》所代表的社会流散研究表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流动研究批评家们已经随着社会流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加上了语言的维度,或者说把视野扩展到了语言的范畴,尤其是英语的传播。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以英国文化研究为主线的西方文化研究主要是在以地点与空间之间的关系为核心的文化地理、文化政治、身份认同等范畴内进行着社会流动的研究,从总体论的角度强调人的流动及由此引起的文化的多元化和混杂、身份的多重性和模糊。批评家们在此间所使用的文本,主要是威廉姆斯意义上的活生生的文化,或者大众文化文本,而不是高雅文化的文本;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定性式的,而不是定量式的,虽然他们在采用文本分析的同时,也广泛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ethnography/field work)。批评家们所使用的理论资源,主要为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后学”,一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 Grossberg)在上世纪末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自身似乎认同于理论和政治问题的日渐收缩。明显存在着一种把文化研究等同于身份和差异的理论和政治的趋势,受所谓的后殖民理论和批判性种族理论影响以来尤其如此。”具体地讲,对西方的社会流动研究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理论家包括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盖娅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米歇尔·福柯(M. Foucault)、斯图亚特·霍尔(S. Hall)、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nidict Anderson)、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等人。而且有趣的是,这些理论家本身也是社会流动的主体,比如萨义德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流动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波斯后裔的巴巴,先是从印度流动到了英国的牛津大学,后来又从牛津大学流动到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斯皮瓦克从印度加尔各答流动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霍

尔从牙买加流动到了英国;克里斯蒂娃从保加利亚流动到了法国。

二、对中国内地社会流动研究的反思及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文化研究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正是因为有了研究合法性的保证,中国内地的社会流动研究不仅在过去的几年中队伍不断壮大,而且已然取得了一些值得肯定的成果,比如批评家们已然从单纯的文学文本走向了包括影视作品在内的社会文本、已然从随笔式思考走向了学理探寻。戴锦华的“798,北京的城市名片”、李阳的“权力之下的身份漂移——以《满城尽带黄金甲》为例”、张慧瑜的“希望之旅,抑或流浪之歌——流动的民工、流动的欲望”等讲座或者论文便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例子。但是让人遗憾的是,在笔者的有限视野范围以内,这样的研究成果实属鲜见。为此,在文化研究后发之地——中国内地——进行着文化研究的我们,必须对我们参与其间的社会流动研究进行深刻反思,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的有效性才能得到保证,我们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应有社会职能才能得到发挥。

比如,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已有的社会流动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流动研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通过对西方文化研究中的社会流动研究经典范例的挪用,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下的社会流动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存在于目前的社会流动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有:第一,研究客体不够全面。虽然农民工和城市下岗职工等弱势群体或者文艺界的边缘群体已然浮出地表或者进入研究人员的视野,但是进行着克利福德所谓的智识旅行的人群,即相对处于优势地位的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吉尔罗伊所谓的“黑色大西洋”,即海外华人流散社团,却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完全处于“失语”状态,尽管中国知识分子的国际国内流动、以留学/移民为代表的跨国流动等现象近年来日益突出。从学理上讲,这本不该发生,因为社会流动的主体本应包括农民、工人、干部、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等不同社会群体。这些分属不同群体的人,随着职业的改变、经济的成败、政治的成败、教育成就、权利控制等,都在无一例外地经历或体验着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个人流动与群体流动、结构性流动与非结构性流动、渐进的流动与聚变的流动、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等。第二,研究视野不够广或在一定程度

上单向度,如单一或过分地强调流动主体的经济或其他某一方面。正如马瑟和吉尔罗伊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每一次社会流动的出现都有其自己独特的缘由,必然都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产物,因此,社会流动及对社会流动的研究维度应该包括流动的个体、流动的原因(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流动的影响等。我们在突出流动主体的经济地位的同时,必须把他们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等也纳入我们的考量范围;或者借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话来讲,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社会学式的考察。第三,研究方法不够多样化,基本上是传统的文学文本解读,克利福德所积极倡导的、莫里斯等人有效地实践和验证过的民族志却几乎处于被闲置状态,所以,我们的研究结果的思想性虽高,最终仍难摆脱低效度、难实施的“厄运”。

为了解决我们当下的社会流动研究之中的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社会流动在中国语境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随着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日益接轨,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流动之间也有了更多的共同之处,比如社会流动机制的日渐完善。“改革开放 20 年来,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这一方面得益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变化的直接推动;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机制多元化,社会流动渠道开通,也是重要原因。”但同时,中国的社会流动(包括改革前的政治主宰型流动和改革后的经济主宰型流动)又在一些方面迥异于西方工业国家的社会流动,如从本质上讲,中国内地的社会流动的主要原因未必如同马瑟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国家政策(政治)在中国内地的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同样相当突出。“制度和政策安排对社会流动的作用相当显著,在有的阶段甚至左右着社会流动。”最突出的例证便是 1949—1956 年的社会大流动、1978—1991 年的社会大流动,尤其是 1985 年开始的三峡大移民。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从社会流动背后的政治动力入手研究社会流动,我们才可能明白为什么某些阶级或阶层,如工人阶级,在社会总体大发展的新时期从中心流动到了边缘甚至被抛弃,而另一些阶级或阶层,如资本家从边缘流动到了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支配地位。

其次,我们必须妥善处理文化研究与相邻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的债务与遗产关系。作为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文化研究始终与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缠绕在一起;英国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它在与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的缠绕之中继承了它们的遗产。但是

这样的和谐举动还从未在中国内地学界发生;在笔者的有限视野内,中国内地的文化研究受学科建制和研究传统的影响,至今还未有过真正与其他学科协同作战的经历,而且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坦诚地讲,当下社会流动研究中的上述问题的产生,与此不无联系。虽然中国内地的文化批评家对社会流动的研究刚起步不久,研究成果还不多,但社会学却已在这方面硕果累累,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点、对流动研究的意义等都已经有了清楚而理性的认识。文化研究实践者完全没有拒绝借鉴社会学研究成果的理由。当然,文化研究不能停留在社会学的基础上,即不能满足于是不是这样和为什么是这样,而是要再往前迈一步,即探询应不应该是这样。例如,我们必须警惕这样的一种观点,即中国的社会流动已经出现了先赋性原则的让位于后致性原则、社会流动的资本由社会转向了文化。在近年探讨社会流动与教育的文章中,一些社会学家纷纷指出各类教育有助于上升性的社会流动,如教育可以在“导引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改变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保证社会流动的公平、公正和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等方面产生作用”。“在今天的社会中,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化的最主要因素。”然而,我们稍加观察和分析即可发现,教育虽然能为人提供向上流动所需要的文化资本,但拥有文化资本并不必然意味着一

定能打破向上流动所必须打破的阶层间的文化屏障,顺利实现向上的流动。比如,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边界日益清晰化,处于相对优势地位的阶层的代际流动日夜突出,弱势群体上升流动的空间十分有限;并且这一状况在进入90年代以后进一步明显了。难怪有人会问:“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事实是,“改革开放后,政治忠诚的作用在减弱,但是,并没有绝对地退出社会流动过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党员资格依然对于获得政治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流动机制中政策、制度这些宏观因素占有重要的地位。”

最后,我们要在一种国际视野下建立起一种社会流动研究的长效机制、理论框架,确定有效的研究方法,为文化研究的终极目标服务。随着中国的“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已经不可挽回地被裹挟进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进程之中,中国的社会流动,包括其速度、规模、原因、影响等,已经不再仅仅关涉中国。所以,作为后冷战时代的批判知识分子,我们既要在对社会流动的研究中注重中国特色,又要保持国际视野,在拿来主义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挪用西方研究成果;尤其不能把对社会流动的研究简单地视为一种学术时尚,毕竟社会流动研究就像社会流动一样,既是一个开放社会的标致,同时也是一个多元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需要。

(责任编辑:朱德东)

Research into social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studies

XU De—l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Culture,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in mainland China ar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result from many reasons and have multiple influences and have been concerned by many scholars in the circle of cultural studies,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Extensively discussing and focusing on low—level mobility and immigration represented by peasant—workers has become a social tide in China. The social mobility research which is undertaken by the scholars of mainland China begins to go in good direction and has made positive results but, actually, has not perfected. Because a series of problems about what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mobility is, how to conduct research about social mobility and so on has not been solved, to some extent, the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in mainland China is still in a mess or in blindness, the scholar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research are difficult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as a resul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is difficult to effect on society.

Keywords: social mobility; mobility research; cultural research; research paradigm